

高校人文与科学教育丛书

Gaoxiao Renwen Yu Kexue Jiaoyu Congshu

Cong Wenhua Yuren Dao
Shijian Chengren

从

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

张国定 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高校人文与科学教育丛书

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

——安庆师范学院特色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张国定 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 / 张国定编著 . —合肥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14. 11

ISBN 978 - 7 - 5650 - 2024 - 7

I. ①从… II. ①张… III. ①师范大学—校园文化—研究—安庆市
IV. ①G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768 号

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

张国定 编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 :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印 张 17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220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印 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2024 - 7

定价： 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汪青松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他要求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同志这一论述对大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化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中国大学文化建设新的召唤。

最近读了安庆师范学院张国定教授的书稿《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这正是一本阐述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专著。全书展现了安庆师范学院坚持以文化育人为主线，以实践成人为根本，实施特色兴校战略的发展史。

当年我在安庆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和师生员工一起亲自参与了文化兴校、文化育人的全过程，对书中所述内容感受深切。为凝练与打造办学特色，学校党政领导班子一直在思考：如何弘扬学校作为安徽高等教育发源地的办学传统，如何发掘和融合皖江文化的资源与优势，如何加强与地方的联系与合作，坚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文化创新。在学校特色文化建设上，大家艰难探索，锐意创新，通过不断实践、反思、积淀，熔铸，逐步形成“文化育人”的办学特色，推出“四成”教育和“顶岗支教”实习等举措，数年的坚持已使文化育人与实践成人展现特色。我由衷地为安庆师范学院近些年来在校党委领导下

特色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新成就感到高兴。

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后，中国大学也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要实现内涵式发展，最根本的是更新教育观念，把教育方式转变与学习方式转变结合起来，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在教师指导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自主成人。2000年，安庆师范学院开始进行综合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根据“厚基础、宽专业、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起“夯实‘三基’、综合拓展、活动创新、人文为本”的综合文科专业课程体系。2005年1月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综合拓展，人文为本”的文章，阐述综合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涵：“夯实‘三基’”，是打好通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师范基本技能课的基础；“综合拓展”，是打通学科间联系，突出专业整合与综合课程的拓展功能，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创新”，是开设综合实践课，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文为本”，是重视建设人文学科，传播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这里的“人文为本”是文化育人理念的最初提出。2004年，学校开始建设安徽省高校“人文教育”示范专业，明确提出“通识为基、人文为魂、能力为本”，“人文为魂”是学校文化育人理念的新飞跃。2008年，学校推进引导学生成长、成才、成人、成功的“四成”教育，并确立“通识为基、人文为魂、能力为本、服务为重”的“四为”教育理念。“四为”教育理念加入“服务为重”的内涵，使“文化育人”向实践平台拓展，是学校文化育人理念的又一飞跃，作为学校新的特色文化——实践文化得以生成。

《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一书以“文化育人”理念原则为引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探讨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皖江文化和校园文化等安庆师范学院特色的理性基础，探讨创建校企协作、校地一体实践平台的文化含义及其促进实践成人的意义。书中“文化育

人”篇侧重将经验总结与理论阐述相结合，“实践成人”篇则侧重将历史叙事和案例分析相结合，从宏观着眼，由现实展开，于细微处落笔，行文风格严谨与活泼相协调。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为学校“文化育人”办学特色正名。2007年安庆师范学院水平评估获优，学校办学特色获得教育部评估专家肯定；随后却有人议论“文化育人”作为办学特色不合适，认为，学校教育的使命就是“文化育人”，只要是办学就要用“文化”来“育人”，各校都在“文化育人”，说“文化育人”是我们的办学特色不一定妥当。张国定教授区分了作为大学教育目标、基本功能的广义“文化育人”与作为安庆师范学院办学特色的狭义“文化育人”两个概念，从综合文科专业学科背景、通识教育理念、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果等层面，有力论证了安庆师范学院“文化育人”的架构特征。

第二，论述了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及其相互关系。张国定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特色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大学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优秀文化基因，潜心培育中国大学的整体文化精神，由此才能担负中国大学文化振兴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神圣使命。大学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并不排斥，而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所大学要创建办学特色，首先要弄清本校文化在共性上是否已经为个性文化即办学特色的创建打造了平台。大学文化建设应是开放式的，安庆师范学院2007、2008年先后与全国教师教育学会、美国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联合举办“科学人文教育融合与复合型教师能力培养国际研讨会”，美国、日本、芬兰、墨西哥、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专家学者出席，安庆师范学院文化育人的办学特色和个性在与国际比较中更加显现出来。

第三，论述了学校实践文化的形成及其与“文化育人”和“实践成人”的关系。学校以“四成”教育为目标，以“四为”理念为引导，以实践文化为载体，实现学校引领、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三位一体，促进了实践成人，使得“文化育人”的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这本书与其说是张国定教授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他亲自参加做出来的。从教育部“师范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研究，到安徽省人文教育示范专业团队建设，再到国家人文教育特色专业建设，张国定教授都是最主要的骨干。我1998年调任安庆师范学院十年里，安庆师范学院先后接受安徽省教委和教育部的三轮教学评议与评估，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极大地促进了学校规模、面积的扩大和质量、水平的提升。当时在教务处工作的国定同志担任校评建办材料组组长、评建办常务副主任、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主任，工作极为辛苦，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没有加班费天天加班到深夜，感冒咳嗽不止还带病工作，为学校的教学评议与评估取得好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4年我和张国定教授一起主编出版了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师范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成果专著《从文科综合到人文教育》。十年过去了，他又送来《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的书稿，我对他在学校文化建设上的执着深为感动。

张国定教授为什么对学校文化育人如此执着？因为他和安庆师范学院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书稿以“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沉思篇开头，以学校文化建设从“文化育人”到“实践成人”为主线，最后落到“实现安庆师范学院百年名校文化复兴”的梦想。作为曾经是安庆师范学院的一个追梦人，我期待有更多年轻同志加入到学校文化建设的“梦之队”中，祝愿安庆师范学院伟大梦想早日圆梦！

（汪青松教授，1998—2008年曾任安庆师范学院副院长、院长，全国教学名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14年9月

目 录

序 言 汪青松 (1)

沉思篇

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 (3)

一、探寻教育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 (4)

二、文化自信是中国大学文化振兴的前提 (9)

三、文化自觉是中国大学文化振兴的基石 (13)

四、文化创新是中国大学文化振兴的动力 (16)

文化育人篇

第一章 文以载道，特色兴校 (25)

一、大学文化与办学特色 (25)

二、文化育人与理念创新 (36)

三、传承创新与特色兴校 (41)

第二章 改革创新，文化育人	(57)
一、以人文文化引导人	(57)
二、以科学文化塑造人	(89)
三、以皖江文化陶冶人	(109)
四、以校园文化感染人	(122)

实践成人篇

第三章 文化主线，“育人”“成人”	(153)
一、生命成长，文化润泽	(153)
二、“四成”教育，“四为”理念	(158)
三、深化文化“四育人”，促进实践“四成人”	(169)
第四章 文以化人，实践成人	(204)
一、特色文化新实践，“实践文化”新内涵	(204)
二、“协作”“双进”平台，实践文化的探索	(215)
三、“顶岗支教”实习，实践文化成人	(219)

梦想篇

中国梦·大学梦·师院梦	(245)
一、安庆的大学梦，承载着多少前辈、先贤的希望	(246)
二、安庆师范学院的兴校梦：百年名校文化复兴	(250)
三、在文化绵延中实现师院人的百年梦想	(258)
后记	(264)

沉思篇

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

大学之道，知识传承，育人为本，厚德载物；大学之道，追求真理，文化创新，自强不息。大学文化代表对完善、崇高人格的引领，承载着塑造新公民的使命；大学文化代表对自然奥秘的执着探究，寄托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希望。因此，大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整个社会文化，代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高度。大学文化既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学自身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政治改革的深入，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加速，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多元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撞在大学校园里也异常激烈与复杂。只要认真观察与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学的整体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大学日益世俗化，追逐利益，迎合时尚，缺乏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不能为社会构筑道德高地和精神标杆；大学充斥着行政化，屈服于权力，缺乏平等、自由宽松的氛围，羡慕追逐官位和贪图享受，甚至出现类似官场上的“科研腐败”；大学教师受“利益价值”的诱惑和行政主导式管理的影响，浮躁惶惑，不能安心从事教学与科研，由于缺乏探讨精神学问的兴趣，又想“抄近路”达到升职目标，以致粗制乱造、剽窃造假屡见不鲜；受经世致用思维和实用主义影响，大学教育过分强调与市场接轨和需求导向，过分渲染和注重工具理性，

严重忽视价值理性，大学师生不是被“文化”而是被“物化”，这在当今已是不争的事实。

张汝伦指出，“今天大家在讨论教育的危机时，都异口同声说，这是体制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更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接着他举例说，“今天学者的处境难道比穷乡僻壤的王夫之更糟糕？为什么出不了这样的大师？”^[1]这与当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问题一样尖锐，只不过钱学森的问题产生的影响更大些。

一、探寻教育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

在“人”的问题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文化”。今天，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更出不了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师，表明我们大学“文化土壤”的贫瘠。几千年来，中国教育形成了尊师重教、敬敷育人的文化传统，中国教育的“文化土壤”本来是很肥沃的，怎么这土壤一下子就贫瘠了呢？这里面的养料怎么就流失了呢？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开始重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兴办大学。1898年诞生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的各类学堂开始以新的方式改革教育内容，推行西方的教育制度，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在中国近代大学的草创时期，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一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传统，一是西方大学文化传统。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力图尽可能延续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主张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通，到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大学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现代大学文化的认识也逐步加深^[2]。

其实，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是北洋大学，它的前身是在

洋务运动时期由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又名北洋西学堂。该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具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中学性质。在此基础上，于1902年改建的北洋大学堂实为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严格地讲，从洋务运动时期起兴办的西学，离真正的大学还是有些距离的。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就是大学，这无疑是对大学理念的误解。形成这种误解的根源有三：首先无疑是受当时救亡图存的特定社会现实的影响；其次与中国历来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有关；其三，受“实用”观念影响，将当时引进的“科学”概念与“工程技术”混为一谈，把“工程技术”误当作“科学”，以为重视“工程技术”就是重视“科学”。大学的宗旨之一就是探索真理、研究科学。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的误解，导致对大学性质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2]，以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及大学文化观念难以走上正轨。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及大学文化观念的根本转变，开始于蔡元培先生提出全新的教育思想。他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阐释了他的教育新理念，他指出：“教育有两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他以“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的教育家分别遵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和“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而形成“隶属政治者之教育”和“超轶政治者之教育”。他认为，像当时的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以发展经济和保民生为宗旨的“实利主义之教育”和以加强公民道德为宗旨、传播“自由、平等、亲爱”的“公民道德教育”都是“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而且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些教育是“不可偏废”的一类教育。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提出了“超轶乎政治”的另一类教育，即“世界观教育”和“美感之教育”，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教育，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这里，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两大类别之教育的划分，表明他科学地把握了教育与政治的“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乎政治”的辩证关系，从而抓住了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中的一个

根本性的问题^[2]。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大学之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大学不是培养“学成”即可“任事”的专门人才的场所，抱有此种目的的人，应该去上各种“专门学校”；大学也不是培养官僚的地方，因此师生均不能抱“做官发财思想”。他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今日中国，有几人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而进大学？蔡先生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教育思想以及关于大学是什么的一番话，仍能切中当今大学之要害。这说明要形成先生所希望的中国大学文化传统，真是路漫漫其修远！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京津三大名校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时的中国大学可谓处境艰难，但当时的政治时局还是为这些大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有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邓稼先等。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开始是照搬前苏联的体制，大面积的院系调整，后来是反右斗争，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到了“文革”时期，高校成了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高教事业面临崩溃边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今天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我们回顾中国短暂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是要探寻教育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12世纪的意大利，那时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自由组织的行会。“这个学社的意大利名称是 universitas，原意可指公共性、共同性，或是一群有共同兴趣和利益的人组成的同仁团体，而这也正是今天的所谓大学 university 的原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学社是独立和自由的，不受王权或教会的控制，在学社的范围内，思想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3]。当时的“大学”是受教会编纂的《格氏法典》中有关法律保护的，西方大学的宇宙宗教精神和世俗人文情怀也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为大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奠基的

是德国的威廉·冯·洪堡。自1809年他倡议建立柏林大学开始，洪堡发展并强化了大学的研究功能，尤其是他提出的著名的“科学五原则”阐明了科学理性的内涵，而“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原则是维护科学理性精神，“培养出具有自由、技艺和力量三重境界的优秀人才”^[3]的根本保证。

现代大学源自西方，大学文化自然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但大学文化的共性与其个性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某个民族的大学文化既要遵循共性的发展规律，也受到该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蔡元培先生领悟现代大学的制度内涵和文化精神，汲取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方能提出现代大学教育新理念，并促使北京大学开始形成“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国学和书院两个系统。早在夏代就已经设了国学“序”，到了商代和周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国学“瞽宗”和“辟雍”。汉代以后国学的设置经历“太学”“国子”和“国子监”等。国学由朝廷兴办，它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主体。创办私学教育的也很早，但最成功的开办者是孔子。中国书院出现于唐代，到了宋代更是书院之风大盛。除了很早就开办的白鹿书院外，还出现了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象山书院等等。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胜景，且由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像安庆师范学院的前身安徽省学敬敷书院就曾请桐城派大师刘大櫆、姚鼐担任山长。这些书院不论公办、民办，或是“民办官助”，与国政一体的国学比，从管理到教学，其自主性和自由度相对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书院的教学传统成了中华世代相传的重要文脉。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主讲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相互讨论。

书院里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是“会讲”。这是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

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辩论，学生也可旁听。那次，在岳麓书院举行的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三天三夜的不同口音的唇枪舌剑高深玄妙，听讲的学子皆无倦意。当众会讲之外，他们还私下交流，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结果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促进了教学。

对于书院教育的最终走向，曾经统领过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只有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书院里的教学方法、教学与学术活动，更有从书院走出的人，像王阳明，不仅是一代思想大师，还是一位有智慧、有担当、有作为的地方官员，足见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改变人的气质，更能使人具备“修齐治平”的志向与能力。

以上，从中西大学教育发展史，从中西大学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出不了大师，其根本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还不深入，对西方大学文化精神的领悟还不透彻。例如对“科学理性”的大学文化精神的认识，我们大都以为，当年的洪堡提出“科学五原则”仅仅是为了增强大学的研究功能，提高大学的学术品位，这可能与他的首要目的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对身在其中的中国文化，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以这种文化传统为核心的古代书院文化精神，也未能深入认识，未能将其精髓融入中国大学文化建设中，以形成中